

# 喀斯特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 ——以贵州省为例

张娟<sup>1, 2</sup> 何立翔<sup>3</sup> 熊康宁<sup>1</sup> 肖杰<sup>1</sup> 杨洋<sup>4, 51</sup>

(1. 贵州师范大学 喀斯特研究院/国家喀斯特石漠化

防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贵州 贵阳 550001;

2. 贵州财经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贵州 贵阳 550025;

3. 贵州财经大学 教务处, 贵州 贵阳 550025;

4. 贵州师范大学 国际旅游文化学院, 贵州 贵阳 550025;

5. 厦门大学 管理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01)

**【摘要】:**厘清喀斯特地区非遗分布的空间格局有利于盘点资源现状, 客观了解区域文化产生过程, 以提高非遗的管理、保护与开发水平。基于地理学空间视角, 利用GIS空间分析方法, 探讨贵州9个地州市1023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类型结构、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 研究发现: (1) 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类型结构层次分明, 民俗类数量最多, 曲艺、传统医药与传统美术类相对稀缺; (2) 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空间分布不均衡, 以贵阳市和黔东南州为双核心, 中部和东部集聚明显, 西部地区分布较少; (3) 贵州省近90%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集中分布在海拔1400m以下的喀斯特低山、中低山区域, 曲艺类占比最高, 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和传统技艺两类分布与主要河流流域拟合较好, 民间文学类与明清时期主要交通干线空间分布关联较高; (4) 地形地貌、水系、文化、交通、经济等自然和人文因素对喀斯特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空间格局产生重要影响。

**【关键词】:** 非物质文化遗产 空间格局 影响因素 喀斯特

**作者简介:** 张娟(1990~), 女, 博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为喀斯特资源管理与区域发展、喀斯特旅游与文化地理。E-mail: zhangjuanjoyce163.com

熊康宁, E-mail: xiongkn163.com

**基金项目:** 国家十三五重点研发计划项目(2016YFC0502607); 贵州省普通本科高等学校服务农村产业革命战略行动计划项目(黔教合KY字[2018]086); 贵州省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项目(黔教合YJSCXJH[2020]112);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XJCZH010); 贵州省世界一流学科建设计划项目(黔教科研发[2019]125号)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在人与自然互动过程中形成的历史活态文化,包括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述、知识、技能以及相关的工具、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等<sup>[1]</sup>,其依附于人这一载体,通过口传心授,世代相传得以延续。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乡土文化的精华<sup>[2]</sup>,作为乡村振兴的文化驱动力,象征民族身份、民族认同和精神追求,蕴含独特而丰富的价值,故非遗研究在当代社会发展进程中具有重要意义。

国外关于非遗的研究主要聚焦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保护与传承、开发利用等。研究维度从传统、精神、情感、历史与社会等方面展开<sup>[3]</sup>,研究内容主要包括非遗的概念阐述<sup>[4]</sup>、传承保护<sup>[5]</sup>、非遗价值评价与挖掘<sup>[6]</sup>、非遗文化身份与认同<sup>[7]</sup>、非遗申报对当地经济及社会发展的影响<sup>[8]</sup>、遗产创意旅游、社区参与遗产保护与开发、遗产真实性<sup>[9]</sup>等。中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国,自2004年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来,国内开始掀起非遗研究的热潮。研究主题主要涉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sup>[10]</sup>、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sup>[11]</sup>、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化<sup>[12]</sup>等。研究内容包含非遗概念探讨<sup>[13]</sup>,生产性保护、数字化保护<sup>[14~16]</sup>等系列保护方式,旅游资源开发<sup>[17]</sup>、遗产真实性<sup>[18]</sup>、文化生态<sup>[19]</sup>等方面。近期研究更加注重实证研究、个案研究、系统研究,聚焦非遗与产业的合理对接方法、路径和模式<sup>[20]</sup>,空间分布与旅游开发模式<sup>[21,22]</sup>、非遗扶贫、非遗与乡村振兴、非遗文化基因挖掘与文化创意、非遗传播<sup>[23~26]</sup>等成为主要研究热点。在研究视角上,大多基于民俗学、旅游学、社会学及文化人类学等学科视角,运用空间分析方法对非遗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的研究零星增加,但总体数量较少。从研究区域看,主要为我国非遗在国家尺度<sup>[27]</sup>及湖北<sup>[28]</sup>、山西<sup>[29]</sup>、福建<sup>[30]</sup>等多个省域尺度的研究,缺乏对喀斯特地区这一特殊地域单元的研究。

喀斯特是用来描述可溶岩及其中发育的洞穴和地下水系统组合的特殊地貌的总称,全球喀斯特面积2200万km<sup>2</sup>,占地球陆地面积15%<sup>[31,32]</sup>,集中分布于中国南部、越南北部、斯洛文尼亚迪纳里克山区等地。喀斯特占我国国土总面积的1/3,主要分布于西南地区的贵州、广西、云南、重庆等省区。较其他喀斯特地区而言,贵州是中国乃至世界热带、亚热带喀斯特分布面积最大、发育最强烈的高原山区,是中国的“喀斯特省”、世界最大的喀斯特地域<sup>[33]</sup>。在此地貌背景下,土壤贫瘠、地表破碎、可利用耕地资源少、生态环境脆弱、人口压力大、产业结构单一等问题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地区经济的发展,使其成为中国贫困人口最多的省份。喀斯特独特的景观特征、环境类型与结构孕育了丰富的非遗文化资源<sup>[34]</sup>。非遗文化因其生活性和艺术性而成为较具开发潜力的文化旅游资源,故非遗资源丰富的喀斯特贫困山区正尝试通过非遗开发来促进地方减贫。厘清喀斯特地区非遗资源类型、结构及空间格局是实现非遗扶贫与乡村振兴耦合的关键。目前关于喀斯特地区非遗的研究大多将某一特定非遗项目作为研究对象,研究内容主要关注旅游开发<sup>[35]</sup>、文化生态<sup>[36]</sup>等,对非遗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的研究甚少。基于此,本文以喀斯特典型代表地区贵州省为例,在查阅文献资料和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借助GIS空间分析工具,对该区域非物质文化遗产空间格局进行研究,并尝试基于喀斯特环境人地关系角度探讨其影响因素,以期整体把握非遗资源禀赋,客观了解区域文化产生过程,提高非遗的管理、保护与开发水平,为喀斯特地区非遗的传承、保护、非遗扶贫与乡村振兴的耦合提供科学参考。

## 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 1.1 数据来源

截至2020年7月,国务院共发布了四批国家级非遗代表项目名录,贵州省发布了五批省级非遗代表项目名录(两者均包括扩展项目)。非物质文化遗产分为国际、国家、省、市和县5个级别,目前贵州有侗族大歌、石阡说春2项世界非遗代表项目,但因其也属于国家级项目,且市和县级的非遗评定标准不同,故本研究不涉及国际、市和县级非遗项目,主要对贵州省拥有的国家级和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关数据进行分析。文中数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博物馆网站、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由于国家级名录与省级名录中存在部分重复项目,且2005年贵州省第一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分类与现行的国家标准不一致,因此本文对名录进行了数量和类别矫正,具体标准为:(1)国家级和省级名录中重复的项目,按国家级统计,省级不

再统计;(2)存在于不同地级市的同一非遗项目,在统计时将其拆分,即每个地级市都将该项计算在内;(3)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申报地区为单位的,该项目计入单位所在地级市;(4)对2005年贵州省第一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各项目的类别进行了矫正,对标国家分类标准,未涉及到的项目按照其属性对应划入国家规定的10种类型中。

## 1.2 研究方法

运用 ArcGIS10.2 软件的空间分析工具对贵州省非遗的分布特征进行分析。先利用 SPSS22.0 软件的基本统计功能对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类型、级别的基本结构进行统计分析,并归纳其总体特征。然后利用区位熵<sup>[37]</sup>、核密度估算法<sup>[38]</sup>等研究方法,对省域非遗的地理空间分布特征进行测度研究。

(1)区位熵。区位熵最早由哈盖特于1996年提出并用于区位分析中,是衡量某要素集中化程度的指标,并反映该要素空间分布特征及某一区域在高层次区域的地位和作用等方面,文中用来测度不同类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集聚程度。公式(1)式中: $i$ 为非遗类型; $j$ 为地区样本; $Q_{ij}$ 为 $j$ 地区 $i$ 非遗的区位熵; $G_{ij}$ 为 $j$ 地区 $i$ 非遗的得分值; $G_j$ 为 $j$ 地区各种类型非遗项目的得分值; $G_i$ 为全省 $i$ 非遗的得分值; $G$ 为全省非遗的得分值。

$$Q_{ij} = (G_{ij}/G_j) / G_i/G \quad (1)$$

(2)核密度估算法。借助 ArcGIS10.2 平台,运用核密度估算法对贵州省国家级和省级非遗项目分布进行密度分析,以反映贵州省非遗项目分布的聚集状态。核密度计算公式为:

$$f_n(x) = \frac{1}{nh} \sum_{i=1}^n k\left(\frac{x - x_i}{h}\right) \quad (2)$$

式中: $f(x)$ 为核函数估计值; $k(x)$ 为核函数; $h>0$ 为带宽; $x-x_i$ 表示估计值点 $x$ 到样本 $x_i$ 的距离; $f(x)$ 的值越大说明非遗项目分布越密集。

## 2 结果与分析

### 2.1 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规模和结构特征分析

贵州省非遗资源十分丰富,贵州省拥有国家级、省级非遗项目共计1023项,国家级有140项,占13.69%,省级有883项,占86.31%。由此可见,国家级和省级数量悬殊较大(图1),但也说明贵州申报国家级非遗项目的后劲比较充足。

贵州省不同类别的非遗项目在数量分布上有显著差异。从国家级非遗来看,贵州省140项国家级非遗项目在不同种类上的分布差异较大:民俗36项;传统技艺26项;传统音乐19项;传统舞蹈16项;传统戏剧13项;传统美术10项;民间文学9项;传统医药8项;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2项;曲艺1项。从省级非遗来看,贵州省的省级非遗项目共883项,民俗有261项,高居榜首;其次为传统技艺(206项)、传统音乐(84项)、传统戏剧(82项)、传统舞蹈(72项);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57项;民间文学、传统美术、传统医药分别为47项、33项、28项;曲艺13项。综上,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类型分布结构层级分明,当前以民俗、传统技艺为主,传统音乐、传统戏剧、传统舞蹈次之,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民间文学、传统美术、传统医药与曲艺为相对稀缺项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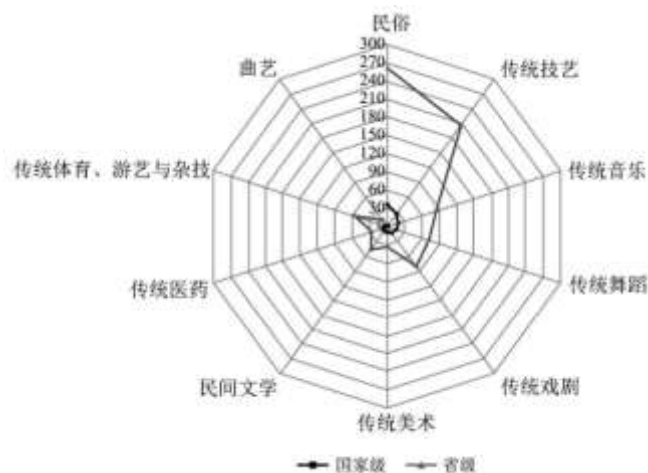


图1 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类型结构特征

## 2.2 贵州省非遗空间分布特征

### 2.2.1 类型的空间分布特征

文中用区位熵来测度不同类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集中程度，以衡量不同类型非遗项目的空间格局，反映其集聚程度。以贵州省9个地州市分布的非遗项目作为研究对象，给不同等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赋值，根据上述区位熵公式(1)得到贵州省9个地州市10种类型的非遗区位熵。

利用 ArcGIS 中自然间断点法(Jenks)将所得区位熵值划分为3个等级:0~0.71;0.71~1.29;1.29~1.67,便于结果可视化表达(图2)。测度发现: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技艺、传统医药区位熵差异小,表明贵州省上述四大类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空间分布比较均衡。民间文学、传统戏曲、曲艺、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传统美术、民俗区位熵差异显著,空间分布集聚明显。民间文学主要集聚于黔中贵阳、安顺及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传统戏剧则主要集聚于省会贵阳和黔东南铜仁市、黔北遵义市和黔西北毕节市;曲艺主要分布于黔西南、安顺、黔南及遵义市;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主要分布于铜仁市、黔西南州;传统美术和民俗主要集中于黔东南苗族侗族少数民族自治州。

### 2.2.2 行政市域分布特征

从地级市市域空间尺度层面分析,贵州省9个地州市皆有非遗项目,但在非遗的级别、类型和数量分布上差异明显。黔东南州国家级和省级非遗数量均位居榜首,分别占总量52.14%和26.95%,黔西南、黔南次之。遵义市虽然国家级非遗项目数量较少,但其省级非遗项目分布位居全省第三,六盘水的非遗项目分布最少。

利用 ArcGIS10.2 对 density of kernel 函数进行测度,生成贵州省非遗的核密度分布图(图3)。从图3可以看出,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核密度空间分布为典型的双核结构,以黔中贵阳市和黔东南苗族侗族少数民族自治州为双核心;二级核心分别为黔西南州核心、安顺核心,点密度分布有集聚型、层级分明的特征。贵阳市和黔东南州为第一层级,贵阳市的非遗点密度分布最高,为108.29项/万 $\text{km}^2$ ,黔东南为102.70项/万 $\text{km}^2$ ;黔西南州和安顺为第二层级,点密度分别为74.98项/万 $\text{km}^2$ 和60.43万 $\text{km}^2$ ;第三层级包括六盘水、黔南州、铜仁;第四层级包括遵义市、毕节市,其中,毕节市的点密度最低,为31.28项/万 $\text{km}^2$ 。贵州省非遗在行政市域尺度上的数量分布和点密度分布大体一致,均呈集聚型阶梯状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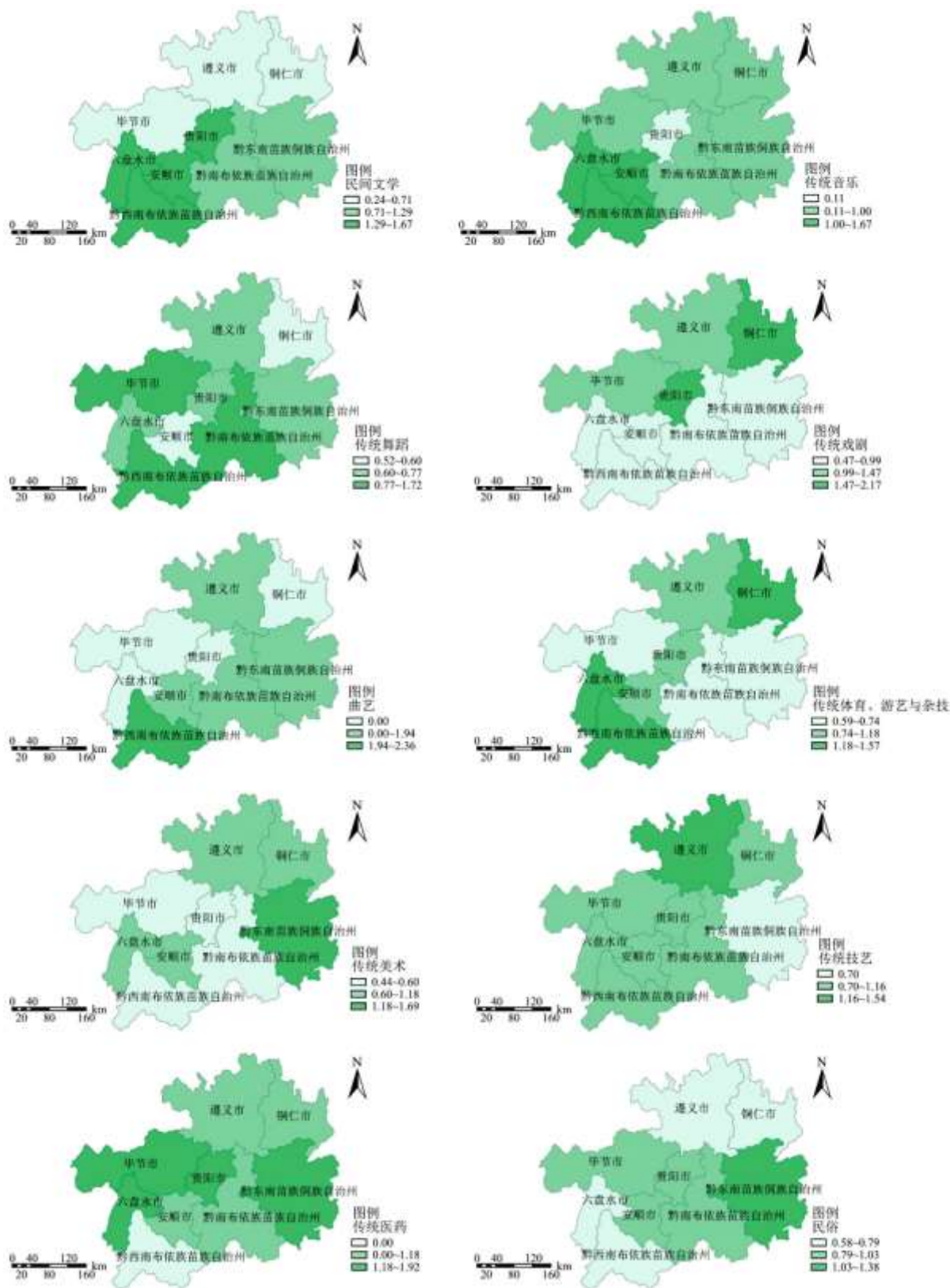


图2 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类型空间分布格局

### 2.2.3 地形分布特征

海拔高度可作为地形要素的主要衡量指标。基于 DEM 数据,提取海拔作为地形因子,研究不同类型非遗项目分布与地形的关系。借鉴已有研究<sup>[39]</sup>,对地形因子进行等间距划分,海拔划分以 200m 为间隔,小于 600m 和大于 2200m 两个等级单独划分。运用 ArcGIS10.2 将非遗分布点与数字高程图进行相交分析(图 4),结果发现,贵州省近 90%的非遗项目分布在海拔 1400m 以下地区,主要集聚在以中部、东部为核心向外扩散的喀斯特低山和中低山区域,曲艺类的非遗在该海拔范围的分布数量最多,占比为 100%。在 800~1000m 海拔,非遗项目分布数量最多,占比为 21.8%,主要分布在贵阳、安顺一带喀斯特低山区及苗岭、雷公山脚的喀斯特中低山地区。海拔超过 1000m 以后,随着海拔的上升,各类非遗项目的分布数量总体呈递减趋势,尤其在海拔大于 2000m 的次高山地区,仅有少数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与民俗分布,其余类型非遗分布数量均为零。

### 2.2.4 流域分布特征

贵州省的八大主要水系分属长江和珠江两大流域,苗岭以北属长江流域,以南属珠江流域,主要包括牛栏江横江水系、乌江水系,赤水河綦江水系、南盘江水系、北盘江水系等。通过将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主要水系的空間分布进行空間匹配分析(图 5),发现贵州省非遗项目主要分布在距离河流 10km 的缓冲区范围内,集聚于清水江、南盘江、北盘江、红水河、乌江、赤水河等流域。距离河流越近的地方,非遗项目分布数量越多,总体随着距离的增加而减少。在 0~2km 缓冲区内非遗分布数量最多,共计 264 项,占比 25.8%,尤其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和传统技艺两类显示出较好的亲水性,占比分别为 30.51%、28.45%。由此可见,贵州省的非遗项目分布与主要水系分布空間耦合良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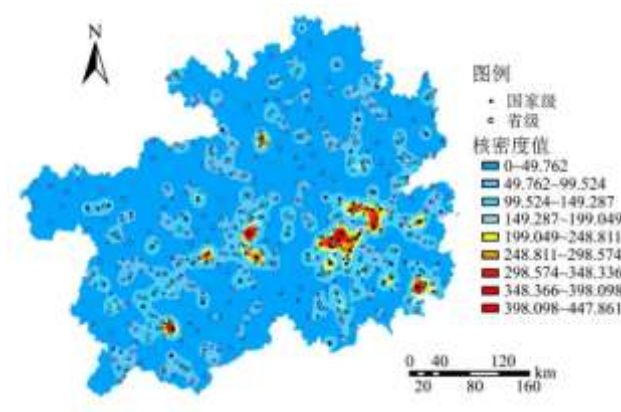


图 3 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核密度分布图

### 2.2.5 交通分布特征

现代交通是非遗传播与发展的重要通道。故文中以贵州省现有高速、省道、县道为基础交通数据库,利用 ArcGIS10.2 分别建立高速、省道 15km 以及县道 10km 缓冲区,将贵州省主要交通网络空间分布与非遗项目空间分布进行叠加分析。结果显示,在贵州省 1023 项非遗项目中,高速缓冲区内有 377 项(图 6a),省道主干线缓冲区内有 790 项(图 6b),县道缓冲区内有 929 项(图 6c)。由此发现,贵州省非遗项目的分布与现代省域内交通干线空间分布有显著关联,其中县道与非遗空间分布拟合度较高。但非遗主要产生于历史时期,非遗与现代交通的拟合情况不足以说明交通因子对非遗产生的影响,故以明清时期产生的非遗为例,进一步论证非遗分布与古代重要交通节点与干线的关联。

贵州驿道肇始于元朝“站赤”,于明永乐十一年置省后,因管理与发展需要开辟驿路<sup>[40]</sup>,逐渐形成以贵阳为中心的驿道交通干线,境内主要有湘黔滇驿道、川黔驿道、黔桂驿道、川黔滇驿道、龙场九驿、靖州至黎平驿道等六条交通线路,清朝对明



朝的驿路进行沿袭并略有损益，直至清末废置<sup>[41]</sup>。明朝前承元朝、后益清朝的道路交通建设，对贵州政治、经济、文化影响深远<sup>[42]</sup>。为了更好地说明非遗分布与交通的关系，文中选取贵州省明清时期产生的 173 项非遗项目作为样本，将其与明清主要交通线路进行叠加分析(图 6d)。但因样本数量相对较少，该分析仅用来判断基本趋势关系。结果发现，在 15km 的缓冲区范围内，距离主要交通干线越近的地方，非遗项目分布数量越多，总体随着距离的增加呈减少趋势。在 0~3km 的缓冲区范围内非遗数量最多，共计 42 项，占比 24.2%，民间文学类非遗项目分布占比最高。

## 3 讨论

### 3.1 喀斯特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空间格局的影响因素

根据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呈现的分布特征，围绕喀斯特景观特征、喀斯特环境类型与结构<sup>[33]</sup>等方面，借鉴已有的研究成果<sup>[29, 36, 43~45]</sup>，基于喀斯特环境人地关系角度探讨地形地貌、河流、文化、经济、交通等因素对喀斯特地区非遗分布空间格局的影响(图 7)。

#### 3.1.1 自然地理环境因素

##### (1) 地形地貌因素

丰富的地形地貌以促进或阻碍人口聚集和文化交流的方式对文化演变产生影响，最终影响着非遗的空间分布情况<sup>[46]</sup>。与其他研究区相比<sup>[29, 46]</sup>，喀斯特地区具有高原山地显著、峡谷深切壮观、洞穴形态丰富等二元三维水文地质结构的主要景观特征，为喀斯特文化多样性的形成提供自然基础。与前人研究结果一致<sup>[29]</sup>，海拔的高低影响非遗的分布。从地区分布来看，由于受到流水溶蚀-侵蚀切割，喀斯特地区地表十分破碎，地势起伏较大，在 1000m 以下的低海拔峰林、盆地和峡谷地区地势相对平坦、水源较为充足、气候优越且交通便利，故该地区内人口密度较大，文化交流较为频繁，利于多元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所以贵州省非遗密度空间集聚在低海拔的峰林-峡谷地区，形成了极核区贵阳、黔东南，呈沿极核区向外递减趋势，而地势较高的毕节、六盘水地区，由于受到山地的阻碍<sup>[27]</sup>，文化交流与传播存在一定的阻力，故非遗分布相对较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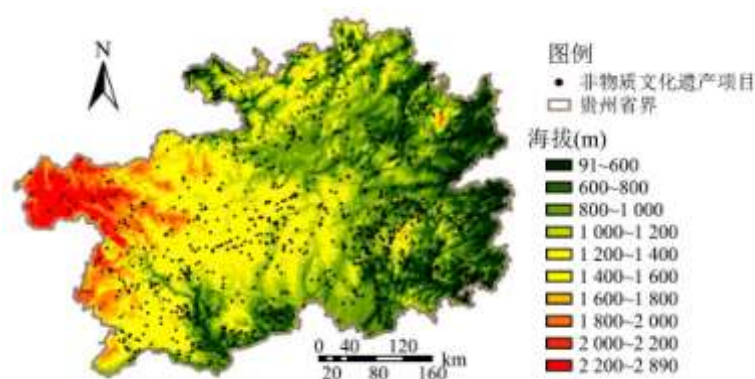


图 4 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地形分布特征

但喀斯特地区复杂的地貌形态组合使非遗文化更具地域性和差异性，尤其体现在类型分异上。高原-峡谷造成的相对闭塞的地理环境割裂了与外界文化和经济的直接交融，造就了地区居民孤独不安的心理状态，他们青睐以粗犷的歌声、直白的语言来表达内心的思想和情感，喜欢在喀斯特洞穴里绘制独特的壁画，在特殊的节日里穿戴靓丽的服饰<sup>[33]</sup>，以此表达渴望与人交往的目的，故传统音乐、传统舞蹈、民俗类非遗项目受封闭的地理环境的影响，总体分布数量较多，且较为均衡，尤其是在海拔高

于 2200m 的地区仍有分布。曲艺衍生于农耕文明,地势低平的地区为传统耕作提供了优越的自然环境,如流传于安顺关岭、镇宁至黔西南贞丰一带的“八音坐唱”曲艺,山水田园的地理环境使布依民族拥有得天独厚的生存条件,其很少受到自然灾害的威胁,在优越的自然环境中有更多时间去追求精神文化,故曲艺类的非遗集中在 1400m 以下的低山和中低山地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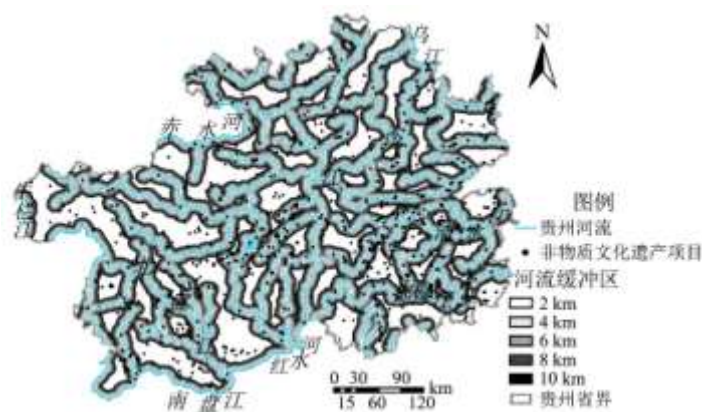


图 5 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流域分布特征

## (2) 河流水文因素

流域文明与人类文明息息相关,河流流域不仅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也是文明不断交流与交融的场所。河流水文主要通过影响人类活动范围而影响非遗的产生与分布<sup>[46]</sup>。与前人研究结果有所不同<sup>[28]</sup>,贵州省传统技艺和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类非遗项目与河流水文的拟合较好。在构造运动和外源水的作用下<sup>[47, 48]</sup>,贵州河流多为山区性河流,喀斯特地貌演化形成的清水江、都柳江、北盘江、南盘江、乌江等大江大河,为当地居民的生活和农业生产提供水源和必要的条件,故喀斯特峡谷沿岸地带为人类历代居住选址的主要区域,且为节约耕地<sup>[44]</sup>,贵州喀斯特乡村聚落大多依山傍水而建,形成人类文化和生产的高密度区。依托河流流域资源优势,乌江流域的白酒酿制,清水江流域的蜡染等传统技艺拥有充足的水源,赛龙舟等传统体育项目具有适宜的活动场所,如铜仁市依托沅江水系的锦江,以赛龙舟为主导的传统体育项目集聚明显。喀斯特地区居民利用自然的生态技艺得以传承和发展,使得产生于日常生活的传统技艺和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两类非遗项目呈现与河流流域拟合较好的分布特点。

## 3. 1. 2 人文环境因素

### (1) 文化因素

民族性是非遗的基本特征之一<sup>[46]</sup>,贵州省非遗的空间分布特征与民族的分布紧密相关。贵州是一多民族共居省份,少数民族人口总量排全国第 4 位,17 个世居少数民族聚居形成了“一山不同族,十里不同风”的民族文化。苗族是贵州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其次为布依族、土家族、侗族,主要分布在黔东南、黔南、黔西南少数民族自治州。贵州少数民族节日众多,音乐舞蹈历史悠久,刺绣、织锦、蜡染等保存较好,故较其他地区而言,黔东南、黔南、黔西南三地非遗数量最多。黔东南州是贵州少数民族最多的地区,在与喀斯特环境的长期互动下,以侗族大歌、反排木鼓舞、苗族服饰、婚俗、苗族姊妹节等为代表的民俗丰富多彩,并在旅游的开发过程中得到一定的传承和发展,因此,民俗类型的非遗在黔东南集聚最为明显。

此外,多元历史文化背景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非遗的产生和集聚。旧石器时代早期形成的黔西观音洞文化,战国、秦汉时期形成的夜郎文化,蜀汉至清初形成的毕节水西文化,明朝形成的安顺屯堡文化及贵阳阳明文化,以喜食酸辣为特色的饮食文化以及充满魅力的酒文化等汇聚在一起,为图腾崇拜、创世神话、讴歌祭调、民间歌舞艺术,民族服饰、民族戏剧、传统技艺等



类型多样的非遗项目的产生提供多元文化背景,如苗寨吊脚楼营造技艺受到夜郎时期的“干栏式”房屋建筑影响较为深刻;灿烂的水西文明造就了独具特色的彝族文化,促进了毕节地区传统舞蹈等非遗的集聚;饮食文化对传统技艺产生重要影响,不同的饮食习惯催生了风格各异的制作技艺,如黔东南州的苗族酸汤鱼制作技艺、毕节市荞酥传统制作技艺等;依托赤水河流域独特气候和区位优势,国酒文化使得白酒酿制传统技艺在遵义市集聚最明显,如茅台、董酒、习酒等白酒酿制技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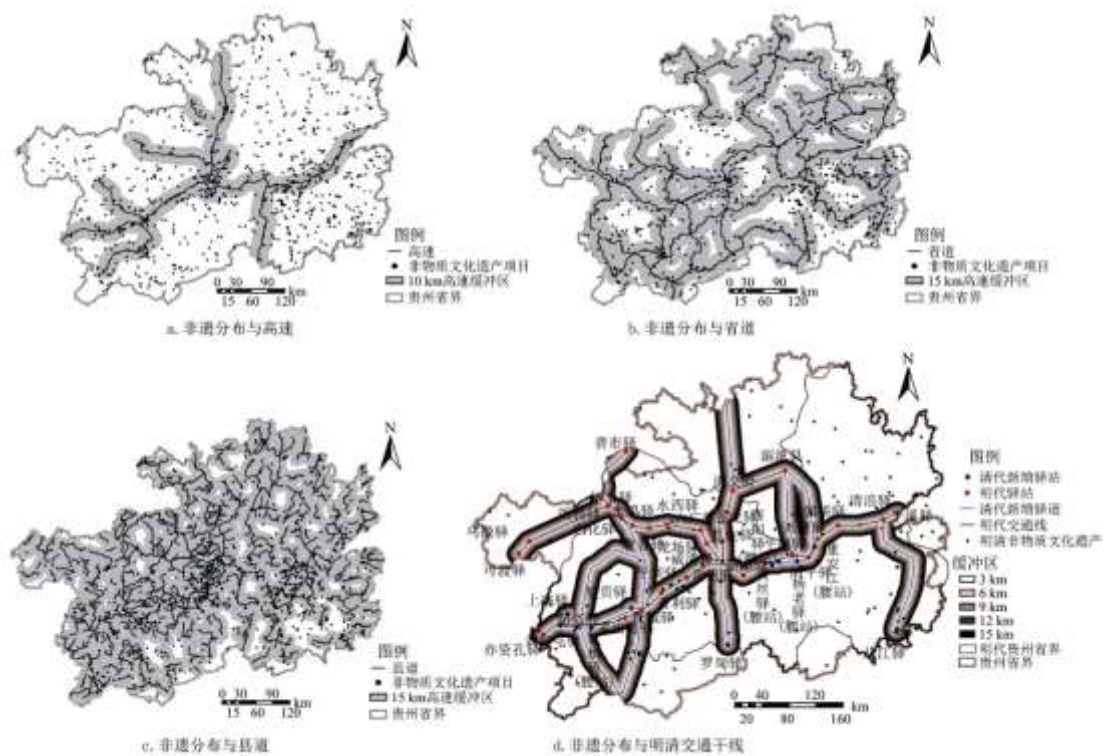


图6 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交通分布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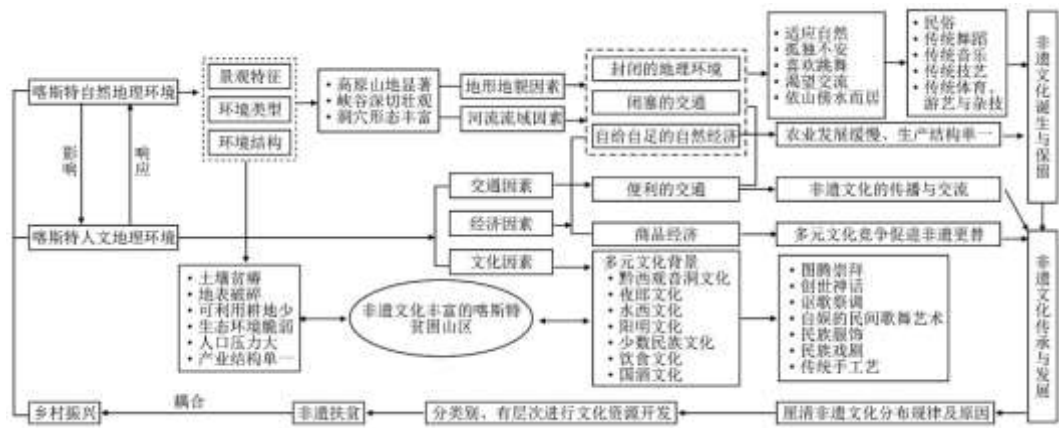


图7 喀斯特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空间格局影响因素作用示意图

(2) 交通因素

通过明清时期的非遗分布与交通干线之间所呈现的规律可以看出,在 0~3km 的缓冲区范围内,非遗分布总量最多,民间文学类占比最高。究其原因,经元明清三代的持续开发、拓展,贵州的交通建设迅速发展,驿道沿线独特的自然地理与人文环境为民间故事的产生提供丰富的素材,使得驿道沿途成为民间故事的富矿区。明、清两代,来自中原、江南的文人学士相继进入贵州从事文学教育活动,如江东子、王阳明等,贵州文学事业获得历史性振兴。境内湘黔滇古驿道上产生的王阳明传说、张三丰传说等民间故事折射出人类民间生活的面相与智慧,散发着浓郁的乡土气息,承载着民族情感、道德传统、凝聚力与亲和力,成为各民族薪火相传的文脉,为民间文学的传承与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所以贵州明清时期驿道沿线的民间文学分布最多,这表明了交通为民族间的物质与文化交流提供了必要的基础<sup>[49]</sup>,也印证了历史上多民族聚居的西南驿道区域为多元文化碰撞提供了交融空间这一结论<sup>[50]</sup>。

文化产业和交通系统存在相关关系<sup>[51]</sup>,贵州现代交通与非遗分布拟合较好也说明了这一点。现代交通的快速发展带来的时空压缩一定程度上加速了非遗文化的交流、传播与创新发展,为产业化的运作提供有力的区位条件。对非遗文化进行旅游开发是贫困地区扶贫开发的探索性实践,交通连接了市场,增进了文化的交流<sup>[29]</sup>,但也对非遗的保护与传承带来一定的挑战。

### (3) 经济因素

经济集聚效应对非遗文化的产生、空间分布与流动传播产生重要影响<sup>[46]</sup>。经济与文化是相辅相承的,经济发展形成的核心区域往往历史文化底蕴较强,经济发展程度较高。交通的改善打破了喀斯特环境造就的闭塞地理环境,成为贵州经济增长的引擎。地区经济发展是地形、水文、文化、交通等自然和人文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贵阳是贵州省省会城市,历史文化悠久,西南交通枢纽地位逐渐凸显,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所以非遗项目的分布集聚明显。非遗项目起初主要反映有关生产生活方面的实用性内容,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加速了多元文化之间的竞争,随之刺激文化艺术往纵向发展而越来越有深度,往横向发展而越来越多样化,进一步促进非遗的生成与演化,非遗项目更多折射人类精神和审美的艺术性内容。但需注意的是,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经济与非遗文化并不一定是同步发展的,往往可能出现二者背离的情况<sup>[43]</sup>,尤其在喀斯特生态系统变异敏感度高、灾变承受阈值弹性小、土少、缺水等地理环境背景下,文化和经济耦合路径的探索对喀斯特贫困山区尤为重要。

## 3.2 喀斯特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研究指示意义

非遗资源因其实用性与艺术性成为具有一定开发潜力的文化旅游资源,厘清非遗空间分布格局及成因有利于盘点资源现状,为喀斯特地区资源开发提供科学参考,以分类别、有重点地进行保护与发展。非遗分布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具有直接联系<sup>[46]</sup>,对其保护可适度结合市场化运作,以推动区域经济发展。下一步研究需关注非遗空间格局与目标市场的非遗感知差异、居民对非遗旅游资源的感知、不同类别非遗项目的品牌建构等,并在此基础上探索如何在盘活非遗资源的同时发展当地经济,实现非遗扶贫与乡村振兴的耦合。此外,交通条件的改善加速了非遗文化的曝光程度,长期封闭的喀斯特环境孕育的非遗文化在快速、频繁的文化交流与碰撞中如何保持原真性并得以延续和创新发展应该受到关注,尤其对于一些非遗资源丰富但经济较为落后的喀斯特贫困山区,在交通条件迅速改善的基础上,如何实现生产性保护与地方经济耦合发展值得进一步研究。

喀斯特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空间格局是时空演变的结果,文中主要对喀斯特典型地区贵州省 1023 项非遗项目分布格局进行了空间分析,研究存在一定局限性。下一步的研究工作应从时间尺度进行时序分析,并明确核心动力机制对影响因素的响应,以更好地厘清喀斯特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产生和发展的规律,有效地服务于地区经济发展。

## 4 结论

本文以喀斯特典型代表地区贵州省为例,将其拥有的四批国家级和五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作为研究对象,借助 ArcGIS10.2 软件空间分析工具,运用区位熵、核密度估算法,对喀斯特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1)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类型结构层次分明,空间分布格局不均衡,以贵阳市和黔东南州为双核心,中部和东部集聚明显,西部地区分布较少。从类型上看,民俗类数量最多,曲艺、传统医药、传统美术类相对稀缺;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技艺、传统医药四类非遗的空间分布比较均衡,其他类型的空间分布集聚明显;从地形地貌上看,贵州省近90%的非遗项目分布在海拔1400m以下的喀斯特低山和中山区,曲艺类分布占比最高;从水系来看,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和传统技艺两类非遗分布与主要河流流域拟合较好;在交通方面,民间文学类非遗与明清时期主要交通干线空间分布关联较高。

(2)喀斯特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空间格局是地形地貌、水系、文化、经济、交通等自然和人文环境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喀斯特地区高原山地、深切峡谷的景观结构是文化产生的自然基础,喀斯特地区复杂的地貌结构造成了封闭的环境、不便的交通和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sup>[62]</sup>,在人地关系演化的过程中,社会、经济、文化系统良性发展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非遗的诞生、传承演替与发展,但机遇与挑战并存。

(3)厘清非遗空间分布格局及成因是非遗保护与开发的基础性工作,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是喀斯特贫困地区减贫的重要策略,在了解喀斯特地区非遗资源分布差异的基础上进行分类别、有层次的开发有利于提高非遗的管理、保护与开发水平,为喀斯特地区非遗的传承、保护、非遗扶贫与乡村振兴的耦合提供科学参考。

#### 参考文献:

- [1]UNESCO.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EB/OL].[http://www.moe.gov.cn/srcsite/A23/jkwzz\\_other/200310/t20031017\\_81309.html](http://www.moe.gov.cn/srcsite/A23/jkwzz_other/200310/t20031017_81309.html),2003-10-17/2020-7-20.
- [2]崔瑾.乡村振兴视域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J].农业经济,2019(6):45-46.
- [3]VECCO M. A defini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From the tangible to the intangible[J].Journal of Cultural Heritage,2010,11(3):321-324.
- [4]KATELIEVA M,MUHAR A,PENKER M. Nature-related knowledge a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Safeguarding and tourism utilisation in Austria[J].Journal of Tourism and Cultural Change,2020,18(6):673-689.
- [5]REN M F.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tangshan “beautiful country” [J]. Agro Food Industry Hi-Tech,2017,28(1):376-380.
- [6]LENZERINI 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The living culture of peoples[J].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2011,22(1):101-120.
- [7]BEN H Y,BRISEBARRE A M,GUINAND S. The cultural heritage of pastoralism-local knowledge,state identity and the global perspective:The example of local breeds in Morocco[J].Revue Scientifiqueet Technique-Office International Des Epizooties,2016,35(2):365-370.
- [8]TAN S K,TAN S H,KOK Y S,et al. Sense of place and sustainability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The case of George Town and Melaka[J/OL].Toursim Management,2018,67:376-387.
- [9]SU X W,LI X,KANG Y X. A bibliometric analysis of research on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using citespace[J].Sage Open,2019,9(2):1-18.

- 
- [10]陈雅忱. 湖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地方性开发路径[J]. 经济地理, 2020, 40(2):227-232.
- [11]孙九霞, 李怡飞. 社会资本视角下非遗传承人的地位获得[J]. 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 36(6):5-11, 2.
- [12]张秉福.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化的科学发展[J]. 甘肃社会科学, 2017(6):244-248.
- [13]范春. 近十年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进展综述[J]. 广西社会科学, 2013(9):56-60.
- [14]翟姗姗, 刘德印, 许鑫. 抢救性保护视域下的非遗数字资源长期保存[J]. 图书馆论坛, 2019, 39(1):9-15.
- [15]鲁幽, 周安平. 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的新路径[J]. 知识产权, 2017, 27(2):64-69.
- [16]刘灿姣, 阳利新.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的研究述评[J]. 图书馆, 2016(2):15-20.
- [17]张希月, 虞虎, 陈田, 等. 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旅游开发价值评价体系与应用——以苏州市为例[J]. 地理科学进展, 2016, 35(8):997-1007.
- [18]周永广, 栗丽娟. 文化实践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径山茶宴的再发明[J]. 旅游学刊, 2014, 29(7):23-30.
- [19]黄永林. 文化生态视野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J]. 文化遗产, 2013(5):1-12.
- [20]钱永平. 可持续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新理念[J]. 文化遗产, 2018(3):8-14.
- [21]江娟丽, 杨庆媛, 张忠训, 等. 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空间格局及旅游开发模式[J]. 经济地理, 2019, 39(6):205-213.
- [22]张建忠, 温娟娟, 刘家明, 等. 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时空分布特征及旅游响应[J]. 地理科学, 2017, 37(7):1104-1111.
- [23]康丽. 实践困境、国际经验与新文化保守主义的行动哲学——关于乡村振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思考[J]. 民俗研究, 2020(1):13-18, 156.
- [24]黄朝斌, 顾琛. 乡村振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造性转化——以傩雕工艺为例[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9, 39(6):50-54.
- [25]卢世菊, 柏贵喜. 民族地区旅游扶贫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协调发展研究[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7, 37(2):74-79.
- [26]李西建. 以文化创意激活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旅游美学效用[J]. 旅游学刊, 2019, 34(5):9-11.
- [27]程乾, 凌素培.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J]. 地理科学, 2013, 33(10):1166-1172.
- [28]陈慕琳, 胡娟, 邱小梅. 湖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分析[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9, 53(3):415-424.

- 
- [29]王清,唐广东,马慧强,等. 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空间分布格局及影响因素探析[J].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2019, 33(10): 185-193.
- [30]李蕊蕊, 赵伟, 陈静. 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结构及地理空间分布特征[J]. 地域研究与开发, 2014, 33(6): 97-102.
- [31]FORD D C, WILLIAMS P W. Karst hydrogeology and geomorphology[M]. West Sussex, England: Wiley, 2007: 1.
- [32]VAN BEYNEN P E, VAN BEYNEN K M. Karst Management[M]. Dordrecht: Springer Netherlands, 2011: 361-378.
- [33]熊康宁, 杜芳娟, 廖婧琳. 喀斯特文化与生态建筑艺术[M]. 贵州: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5.
- [34]杜芳娟, 熊康宁, 高红艳. 喀斯特文化旅游资源与开发研究——以贵州为例[J]. 中国岩溶, 2008, 27(1): 86-90.
- [35]刘愿理, 廖和平, 巫芯宇, 等. 西南喀斯特地区耕地破碎与贫困的空间耦合关系研究[J]. 西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9, 41(1): 10-20.
- [36]胡馨月. 喀斯特石漠化贫困地区文化生态发展研究——以贵州省平坝县桃花村为例[J]. 湖北农业科学, 2015, 54(2): 474-479.
- [37]倪向丽, 吕宛青, 张冬. 基于区位熵的旅游产业集聚发展实证研究: 以云南为例[J]. 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 40(4): 55-60.
- [38]蔡为民, 肖婷, 毕芳英, 等. 基于核密度估算的大都市耕地数量空间分布特征分析——以天津市为例[J].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2019, 40(1): 152-160.
- [39]程东亚, 李旭东. 贵州省乌江流域人口分布与地形的关系[J]. 地理研究, 2020, 39(6): 1427-1438.
- [40]魏冬冬. 明清贵州诸驿沿线生态变迁及影响研究[D]. 贵阳: 贵州大学, 2017.
- [41]郭茂平. 清至民国时期贵州行旅生活研究[D]. 贵阳: 贵州师范大学, 2018.
- [42]钱星. 浅谈明代贵州山地交通[J]. 贵州民族研究, 2014, 35(12): 194-197.
- [43]刘荣昆. 贵州喀斯特地区少数民族生态文化及其价值研究[J]. 生态经济, 2017, 33(12): 223-227.
- [44]赵星. 贵州喀斯特聚落文化类型及其特征研究[J]. 中国岩溶, 2010, 29(4): 457-462.
- [45]应奎, 李旭东, 程东亚. 贵州人口老龄化空间格局演变及环境成因[J].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 2020, 29(2): 334-345.
- [46]吴清, 李细归, 张明. 中国不同类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空间分布与成因[J]. 经济地理, 2015, 35(6): 175-183.
- [47]熊康宁. 新构造运动对贵州锥状喀斯特发育的影响[J]. 贵州地质, 1996, 13(2): 181-186.



- 
- [48]熊康宁. 关于锥状喀斯特与塔状喀斯特的水动力成因研究——以黔中地区为例[J]. 中国岩溶, 1994, 13 (3):237-246.
- [49]吕超, 李臣英. 交通发展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以贵州省为例[J]. 湖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 38(4):87-95.
- [50]何茂莉. 多民族融合与文化一体化——以西南古驿道区域民间故事为中心[J].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2019, 29(4):172-184, 217.
- [51]薛东前, 樊婷, 赵少敏. 西安市文化产业发展与交通网络的空间耦合关系研究[J].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2019, 33(4):82-88.
- [52]屠玉麟. 独特的文化摇篮——喀斯特与贵州文化(贵州文化系列丛书)[M]. 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 2000:21-22.